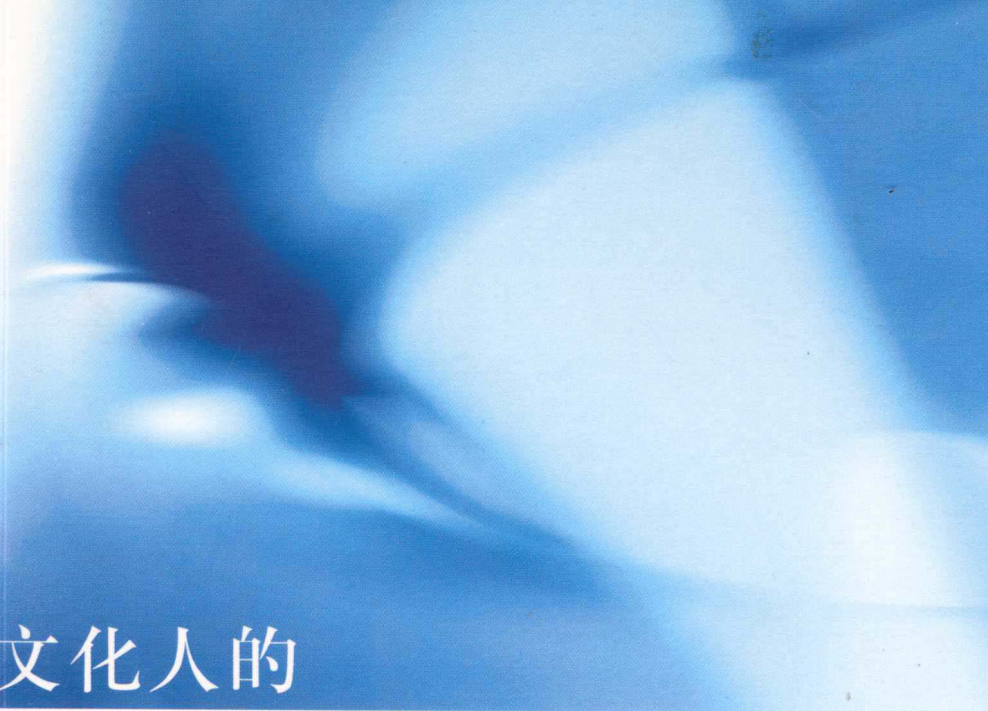




文化人的

感情世界



文化人的 感情世界

何国忠

嘉阳出版有限公司
Gemilang-Jiayang Sdn. Bhd.
(520992-H)
Lot 28-A2, Jalan 5/32A,
Mukim Bt. 6½, Jalan Kepong,
52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6250 3396 Fax: 03-6250 9300
e-mail: jiayang@tm.net.my

© Gemilang-Jiayang Sdn. Bhd.

200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名：文化人的感情世界

作者：何国忠

封面构图与设计：陈维钊

ISBN: 983-171-320-6

版权所有，本书任何部分若未经版权持
有人允许，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或翻印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Hou, Kok Chung, 1963-

[Wen hua ren de gan qing shi jie]
文化人的感情世界 / 何国忠著
(考槃书系; 1)

ISBN 983-171-320-6

1.Malaysian essays (Chinese). I. Title. III. Series: Kao pan shu xi; 1.
895.1452

印刷：
Herald Printers Sdn. Bhd.,
Malaysia.

文化人的感情世界

目录

- 001 多学习，少张望
- 005 我们都是如此走过的
- 009 总不能那样轻待文人吧
- 013 文人需要多少钱才能维持生活？
- 017 书里书外
- 023 把小孩全拉到一处玩
- 027 为何流泪
- 033 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
- 043 许我循着林岸穷究你的泉源
- 051 文人相重
- 057 只要你身体结实我便放心了
- 061 人间今夜浑如梦
- 067 遗忘空间
- 071 吹不散心头的人影
- 077 醒来我自披衣开窗坐
- 083 苦雨斋将不知是什么样儿了

089	我懂得
095	昔我往矣
101	夫人，我多么爱你
107	永远的局外人
113	花开花落
119	举首忽惊明月冷
125	被遗忘的医生
131	那个槟城人
137	终识父语
143	郑良树老师的心事
149	我默不作声地望向窗外
155	只有一叶虫蛀的桔黄
161	我的兴趣是“游手好闲”
167	老师累了
173	后记

多学习，少张望

钱 钟书在〈释文盲〉一文中把不将文学作品当作一回事，只看形义音韵的语言学家比喻成“文盲”。他说他们是苍蝇看世界，犹如“格利佛 (Gulliver) 在大人国瞻仰皇后玉胸，只见毛孔，不见皮肤”。但苍蝇的宇宙观不全是一无可取；“它能够在一堆肉骨头里发现了金银岛，从一撮垃圾飞到别一撮垃圾时，领略到欧亚长途航空的愉快，只要它不认为肉骨之外无乐土，垃圾之外无五洲，我们尽管让这个小东西嗡嗡的自鸣得意，就只怕学者们的头脑……以为此外更无学问。”我看了心里好笑。想起近年来马来西亚兴起语法学，课程乏味不说，比较可惜的是要将中学华文课少许的时间分割。我许多教书的同学更是被这个他们既无兴趣也无心得的“新兴之学”弄得焦虑不安，极为狼狈。

但我们的问题不只是可怕的“格利佛”视野，还有课文对文学性和娱悦性的疏忽。由于本地化的强调，中学课本近乎一半的文字都是急就章，因为题材的需要而被选了进去。我在开斋节假期中在一位同学家看了中学课本的选材，在这个层面上

觉得自己的中学时代比现在的人幸福多了。

课本的文章一向让人觉得乏味，因为它们过于重视思想意识、主题之类的玩意。但在我的中学时代许多所谓文字健康的课文中，值得沉吟再三的还是不少。我们的华文班很失败，华文课时有时无，老师直接为我们导读的作品寥寥无几。但课余翻阅，许多文章还是刻骨铭心，这些文章都是仔细挑选的。当时的选择空间很大，从古到今，大陆、港、台的好文章都尽在眼前，虽然有一些白话文字和今日的表达习惯格格不入，特别是五四时期的作家。年轻时的余光中大喊要下五四的半旗，胡适之也感叹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永远不能恢复她的天然脚了。但五四或者是承继那一代文风的人文人，他们的境界却是当代人难以比拟的。那种信手拈来，字字珠玑的气质，让后来者望尘莫及。研究中国现代散文而名噪一时的学者郑明娳被一位记者追问最喜欢的作家是谁，她想了想说：“周氏兄弟。”其爱不释手的理由大概就是如此。

一九九九年底柳存仁先生为林连玉基金讲座来马，回去后来信，谈起了本地一些朋友邀他写稿，有些感触，盘旋在我脑海里是以下的一段话：“现在年青人当令，一般华文的写作想怕还不曾达到大家的理想，主要他们要多看别人的书（指八十年来著名的好书，非近二十年来覆瓿之作），多学习，少张望，这是仁的过分的话，现在……告诉您说说。”虽然这是私人笔录，但因为有参考价值，因此冒犯抄给诸位一看。柳先生今年八十四岁，他的学问如何？如今活着的学人中在渊博上恐

怕没有多少人能出其右，他来过吉隆坡几次，听过柳先生说话的人应该清楚我对他的形容，这话也不必细说了。

《围城》中引了戴理延 (Jules Tellier) 的比喻，“有个生脱发病的人去理发，那剃头的对他说不用剪发，等不了几天，头毛压根儿全掉光了，大部分现代文学也同样的不值批评。”觉得对上述柳先生的话是个极好的注脚。读当代的文章当然有些好处，它的时代感本身就占尽了便宜，读者立刻可以进入情况。我们看到年轻人爱读中文报纸，是没有理由批评的。如果他们流连副刊，对文坛或华文教育都算是一种功德。在马来西亚报章刊登出来的文字，不会有意识不良的问题，不过是否能够增进一个人的文学修养，却也未必让人乐观。报章中当然有让人惊喜的好文章，但更多作品可用消费文化的角度审视，即是一边制造，一边消费，都是为了应景、打发日子而存在的。身为读者的我们，总得有一些阅读经验才可以判断作品的优劣。如果想要学习效果，大概就不如看从前的文章更为节省时间。过去好的文章都有人费尽心思将它们留下来，重编或再版都功德无量，不值得留传的文章早就消逝无踪了，沧海遗珠当然是这种历史变迁的负作用。但是这样一种过滤方法，却为想读好文字的读者省下不少麻烦。这么说只不过想替柳先生的话做些补充。

我去年当大专文学奖散文组的评判，觉得有才华的青年颇多，但却感觉我们的年轻人阅读的书物大体有限，以致我们在读完他们的文章后无法有勃莱克 (William Blake) “一花一世

界，一沙一天国”的联想。我们会用“文字细腻”、“内容引人”或有“巧思”概括我们的读后感，却无法用“深度”、“国学基础很好”去形容他们或他们的作品。这些话不容易在这篇小文章中说清楚，去读读鲁迅、周作人、胡适、冰心、徐志摩等人，包括柳存仁先生在年轻时所写的东西，上述的话就不言而喻了。

(2001年1月14日)

我们都是如此走过的

有一年过年，冰心的曾祖父去向人家收裁缝工账。因为不认得字，被人家耍了。他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就含泪走了出去，半天没有进来。曾祖父出去看时，原来她已在墙角的树上自缢了。他连忙把她解救了下来，两人抱头大哭，这一对年轻的农民，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誓：将来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拼死拼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好替父亲记账、要账。

冰心在她的回想录中记了这样的一幕。这种故事从前常有，有钱的人骗没有钱的人，受过教育的人欺负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两人抱头大哭”，那样的春节当然刻骨铭心。

读了书以后不见得不被人欺负，怀才不遇或生不逢时是读书人无止境的牢骚。一九〇五年科举停办后，许多待考的书生一时不知身在何方，又由于年龄及经济能力，无法进入新学堂。群体性对现实的疏离与不满是那个过渡时期的特有现象，《光绪朝续东华录》说：“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

数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保送优拔人数定额无多，……不免穷途之叹。”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就是这一类人，这个人呆气十足，书是读了一些，但却不会营生，愈过愈穷，几乎到了讨饭的地步。他被人取笑，看这个故事的人也许还会说读书误人。这是小说中的人物，现实中认为书中没有黄金屋的人也不少。华教斗士林连玉的父亲林赓飏就是一例。

林赓飏是清朝的廪生，这家人可算书香门第，林赓飏的父亲是贡生，林赓飏除了研习旧学外，还受了一些新教育，对数理尤有心得，可是无人赏识，一生潦倒贫困，林赓飏觉得儿子应该读书，但不必太多，在十六岁的时候他将孩子送到厦门学习经商，林连玉后来考进集美师范学院，父亲勉强同意。林连玉在一九二七年失业而南来，老人家当然心有戚戚然。

这些轶事，当然都不是寻常逗笑的寄托。痛定思痛，又发现许多烦恼也在我们这一代繁衍。孩子进入什么源流的学校，选择什么样的科系，都让人皱眉。后者是现代教育发展使然，前者则是马来西亚的特征。学生到了一个阶段，兴趣和能力都有了眉目，科系问题因此没有那么尖锐。但是选择什么源流的学校，说父母心中有爱也可以，说有些矛盾也可以，那是替下一代的幸福斟酌。丽阳镇白沙罗华小最近请了张永庆和我去谈华文教育，其中一个家长要主讲人给意见，到底应将孩子送入独中还是国中？

在那个闹得满城风雨才建好的校舍中，我想的是另一个问

题。不管进入独中或国中都一样要面对学习三种语文的压力。我们在购物中心看到许多父母用破破烂烂的英文和孩子对话，显示父母的成长经验和阅历在影响着他们对下一代的塑造。陈祯禄有一次揶揄林连玉说孙中山和尼赫鲁之所以厉害，因为他们学习英文。“我自己所以厉害，也是因为我学习英文。可惜你不懂英文，不然也是一个厉害的人物。”五十年前的这一段对话，记录在林连玉的《风雨十八年》里。当年陈祯禄踌躇满志，他在马来西亚社会无人不知，而林连玉的演讲固然座无虚席，但他的名气只是局限在华人社会。不懂英文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英文吃香有目共睹，林连玉和陈祯禄见面的时候要找人作翻译，新一代受过华文教育的华人都能以国语或英语沟通，没有请人当翻译这一回事了。这些人大概可以对不懂华文的朋友说：“我自己所以厉害，是因为我学习华文，可惜你不懂华文，不然也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维护华教的人不必担心没有人进入华小，每年九成左右的华人父母都依照他们的意愿。这里头的问题不是英文、马来文或中文孰轻孰重的考虑，而是要等量齐观，让三语都运用自如。像我们这些中文系毕业的人文工作者也清楚个中滋味。我大学念的是中文，硕士和博士论文的用语是英文，如今教书则用马来文。我的学生或研究生都说用非华文研究华人文化好苦。我想起自己在伦敦躲在小房子念书时，萧瑟的季节，寂寥的寒天，修的是汉学，最大的压力却来自英文书写而不是汉学的研读，短短一行字的表达可以折腾老半天。

学习不同的语文固然撩人兴味，但我们不是语文专家，顾此失彼成了长期萦绕心头的垒块。许多人都认为自己精通三语，这不过是将求精求好的标准放在最低一格，没有想到文化内涵在不知不觉中走向浅薄。如果从爱心出发，我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只学两种语文。但这些都是奢想，每个人都会想到生存和就业的问题，无暇去管样样都懂，样样不精的铁律。唯一和冰心曾祖父母不一样的是，我们不必对天立誓。这条路这一代走过，新一代也将继续。孩子向我们埋怨，最多回应他们说：“爸爸妈妈都是如此走过的。”

(2001年11月5日)

总不能那样轻待文人吧？

“那时候还没上大学，住在花莲，有一天忽然收到一封信，打开一看，原来是稿费，不知道什么时候，马来西亚的《蕉风》竟然刊登了我的一首诗。我当时有些兴奋。不只因为许多人嗤之以鼻的现代诗竟然可以飘洋过海到南洋，最令我想不到的是，原来写现代诗也有稿费可拿。我在台湾，从来没有拿过稿费。”这是杨牧二〇〇〇年底在《星洲日报》总社演讲时说他和马来西亚在五十年代末期的一点小因缘。杨牧说话像他的散文一样，非常内敛，不唱高调，不理时潮，不哗众取宠。那个时候台湾穷得不得了，文人写文章，总得找些超出一己利益的理由。即使是抒情诗也是如此，“一个人能在生命的过程中留下痕迹是好的。”这是杨牧在《花季》后记中的话，写作“是一种奉献，更是一种探问，我希望知道的是，这世界上还有喜欢‘美’，喜欢‘永恒’和喜欢不太真实的寂寞的人。”于是稿费只是辅助，只是奖励，只是锦上添花，后面那个推动手中笔的声音才比较厚重和有力。那个声音可能是使命，也可能是信仰，成为大诗人或者成为大文豪当然也可以

是很动听的口号。但是没有稿费的日子已是尘封旧事，现在大家都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新春回柔佛时，顺道回去探访一位在新加坡念书的学弟，这位学弟研究的是钱穆的思想。穷书生都有一些傻劲，博士论文题目敲定以后，不管三七二十一，花了四千二百元马币，买了精装五十三册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回家时看到新婚太太，才觉得有些内疚。为了买书而忘了吃饭的经验许多人都有，施蛰存在《乙夜偶谈》提到有一次他到上海城隍庙里桥上的一个旧书摊，一走上桥就碰到阿英。阿英就是钱杏邨，研究通俗文学的人都知道他写过一本掷地有声的《晚清小说史》。阿英喜欢收集破破烂烂的残书小册，一见到施蛰存开心不已：“来得正好，借我一块钱。”说是挑了一大堆书，老板讨价五元，给他三元不卖，大概非四元不可，无奈口袋里只有三元，施蛰存借他一元五角，一元凑足书价，五角当车钱。

我一直觉得这个社会欠文人很多，文人说话都不够痛快淋漓，他们只是偶然和书商讨价还价，想以廉价买得一些需要的书，其他涉及利益的场合往往吞吞吐吐，尽量避免将“钱”这个字说破。《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中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以《中国哲学史》名闻中外的冯友兰一九五〇年离美回国时，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冰箱都装满了东西，带回中国卖，这个精打细算的故事一直都成为笑话。连一向厚道和圆融的胡适在晚年向他的助手胡颂平提起这个掌故时，也一样充满贬意。文人就是不能讲钱，多一些打算大家就

说他们寒酸气十足，有损辛苦经营的书生气质。大部份的文人不懂得面对报社，不管报社给多少稿费，他们都一声不吭。前阵子有几位写作人嚷嚷稿费太少，更早的时候也有人为文抗议，但说总归说，稿费还是免疫于通货膨胀率。只不过物换星移，我们发现，年纪大的人已经学会一笑置之，不平之气转由年轻人代言，但是年轻人也一样会步入中年，然后老去。

所以写文章还是一样得找有“大我”气味的辩词，要不然无以为继。但时代不同，心情不同，使命感不一定管用。我有一位朋友封笔已经一段日子，因为不能忍受被剥削。一篇文章的稿费买不起一本售价一般的小书，情何以堪？只有“侮辱”二字可以概括。但文人都不明讲，只以工作忙碌搪塞编者。编者年轻，也不知道背后心情。再说各家报社都有自己的作业方法，即使明讲也于事无补，露点火气最后受伤的还是自己，报社始终还是不知道分寸。有一些人的确是不在乎稿费，一千字换取马币二十元或三十元他们觉得合理，他们还是相信文章是经国之大业。社会有那么安贫乐道的朋友，报社永远都不必担心有人会杯葛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典型资本社会图景。

但是有一些人的确不将发表文章当作一回事，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朋友即是。他是健笔，功力够厚，知道自己的文章何价。他本来就惜墨如金，如今感觉尊严受到蹂躏，不愿被报社所役使，那也是图个自在。有见识又有文采的文章越来越少，损失最多的还是我们这些对报纸内容要求比较高的读者。余英

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记了清代儒生洪亮吉和汪中在扬州的故事。有一个黄昏，二人在书院聊天，看到一位身穿三品章服的商人下车，一位读书人见到这位商人，马上趋前说，昨日前日都到府上去叩谒问安，请问你知道吗？商人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点了一下头，不看他，也不答话。余英时说那是士商关系一幅“绝妙的白描图”，又说这个读书人对商人的唯唯诺诺，“倒是有代表性”，听起来的确别有一番滋味。这样的故事肯定不是空前，也不是绝后。

文人被折辱的故事常有，但不是人人都逆来顺受。有些文人就是有傲骨，想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终于在时不我与社会中坚持一点小小的原则。发这样的脾气情有可原，这种不愿受轻待的文人让人觉得既可爱又有个性。归根结底其实也稀松平常，谁都可以向社会呈上他们的抗议和辞职信。

(2001年2月25日)